

国企岂成个人“提款机”

■ 杜才云 职员

据河北省纪委消息:日前,经河北省委批准,河北省纪委对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社平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王社平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出入私人会所并接受私营企业主的宴请;违反组织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向从事公务的人员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礼品、礼金;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在企业经营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收受财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和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以及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收受财物问题涉嫌犯罪。(5月23日,新华网)

已辞职市长梅永红说过:“很多官员

对企业家那种气势令人心寒。”在梅永红眼里,企业家有时确实是弱势群体。但在国企,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部分国企的老总,把国企直接当成“提款机”,那“气势”堪称“气吞金钱如虎”。

“船载千斤,掌舵一人”。国企,就是中央或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核心支柱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身为一名国企负责人,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国企,让国企更有生机活力,更有“前途”和“钱途”,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不容有丝毫敷衍懈怠,不容有丝毫奢靡浪费,不容有丝毫私心杂念。否则,轻则愧于心,重者愧对党的重托,严重者则涉及违法犯罪。国企负责人如何“掌舵”,不可小视,更不可无视。

国企“老虎”是这样产生的。据报道,王社平作为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其违纪手段隐蔽,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且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特别恶劣,情节十分严重。可见王社平完全把国企当成

了自家的“提款机”,是一只贪得无厌的“老虎”。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王社平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把国企当作个人的“提款机”,为所欲为;把手中的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箱”,大肆敛财。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王社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按程序终止其党的十八大代表资格,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实为咎由自取。

近年来,国有企业滋生“硕鼠”甚至是“老虎”,已是目共睹,其中产生了诸如蒋洁敏、王帅廷、宋林、孙兆学、徐建一、廖永远、王天普之类的腐败分子;党的十八大以来,“老虎级”国企高管“落马”近十人,折射出国企腐败的严重性和国企反腐倡廉的艰巨性。

国企负责人为何产生腐败堕落问题较严重,究其因,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国企负责人掌握着企业资源、资产、资金的管理处置权,以及人事权、财权,自然是

社会及内部人员“围猎”对象;其二,国企董事长、总经理等企业负责人权力相对集中,内部纪检组监督制约显然难以到位,群众监督难以实现,媒体监督难以进入,必然出现管理“漏洞”和监督“真空”,让负责人有机可乘;其三,倘若国企部分负责人理想信念丧失,自律防线崩塌,大搞权力寻租,把国企当成“提款机”,很容易成为“老虎级”贪腐人员。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王社平的“落马”,对于众多国企来说,又是一面警示教育新镜子,特别是各地国企负责人及“管事”的“实力派”人员,都要多照照这面镜子,有把国企当个人“提款机”问题的负责人当首自新;没有上述问题的当自勉自警自励、自觉接受组织监督纪律约束。要通过这面镜子,在国企负责人中构筑更廉洁的底线、树立更优的担当、争取有更大的作为,把国企做大做强,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巨大贡献。

管理体系 ≠ 空头文件

■ 蒋坛军 资深管理顾问

不少企业在建立精益生产、TPM(全面生产维护)、ISO9000质量、ISO55000资产等管理体系(或管理模式)时,居然以建立一套文件为终极成果,例如管理手册、规章制度、程序文件、指导书、表格等。

当然,不是说不需要建立文件。没文件会导致做工作无从下,运行会失去划一的准则,人员培训会缺乏一致性等,继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会受到影响。但把主要心思用在做精美的文件上,而不是放在文件的执行、执行结果的检查和改进上面,于是文件就成了空头文件。而把文件视为终极成果,基本都会打造一个像模像样的文件室、或电脑文件库,类似于少林寺的“藏经阁”。但问题是,光有“藏经阁”却不去苦心修炼,又怎么可能成为“扫地僧”呢?

实际上,“搞管理体系就是要搞一套文件”之观点和做法,既是文牍主义的典型表现,也是对管理体系的严重误读。但凡管理体系者,“有效性”是其生命力,是其最基本的要求。例如:推行精益,要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推行TPM,要改善OEE(设备综合效率)和设备全生命周期投入产出比;推行ISO9000,要提高客户满意度、降低不合格率和质量成本;推行ISO55000,要提高总资产报酬率,等等。换言之,推行管理体系若只是建文件,则未达到“有效性”这一最基本要求。“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曾如此说:“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道理’,而在于成果。”文件充其量只能算是“道理”而非成果;成果是指市场份额、营业额、利润、社会价值等事项。

笔者曾目睹一个两千人左右的工厂,其管理手册、程序文件、规章制度、指导书、表格、外来文件等,加起来居然超过一千份,其中有很多文件不要说去执行,连看都没人看。而且,文件往往与会议紧密关联,“文山会海”这个成语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便是空头文件,企业也要花宝贵的时间与精力开会进行起草、讨论、审核、宣贯。另外,文件一多,互相矛盾的规定就多,懒政者常惯于借这类文件来推诿责任。更有甚者,一些部门在起草文件时,缺乏全局观念而心怀部门墙主义,素爱写上只有利于本部门局部利益的规定,以制约和挤兑其他部门。建文件理应是一件增值的工作,所建的文件既不应成为空头摆设,也不应成为白白消耗宝贵时间与精力的一个源头,更不应成为懒政者和部门墙主义者的盾牌。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空头文件、文牍主义在不少企业大行其道,与企业高层对管理体系的认知程度、价值取向有直接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在治军治国中消除文牍主义的方法,完全也可用于企业管理体系文件的建设:

一、严肃对待。注意调查研究,勤于观察与思考,做到精通业务。毛泽东主席曾称赞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二、明确规定:目标明确、职责明确、任务明确、方法明确。三、减少发文(或合并使用)。可发可不发的文件,坚决不发。他特意提醒同事:“下面的同志深感文件太多而痛苦,我们应加以注意”。四、简明扼要。重复的话要省略,可以不说的话要坚决压缩掉。五、切合实际。内容要符合客观实际,掌握分寸,恰如其分。六、力抓落实。他曾严厉批评“公文旅行”的做法,“为什么非得把文件传过来传过去,尽画图,还不是官僚主义?有的事画图了半年还解决不了,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也不知道”,“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任龙,《邓小平与秘书工作的不解之缘》,2008年7月《党史博采》杂志)

企业在建设各类管理体系时,“文件多且精美,管理乱与低效”的情形并不少见,故而考核管理体系建设的优劣时,应以绩效成果为导向,而不应以建立文件为导向;应多下现场去验证绩效成果,而不能只是在办公室、会议室看文件听汇报就算完成了验证;对于“搞管理体系就是要搞一套文件”的观点和做法,应及时予以批评和纠正。

建筑工人工资 秒杀白领 是市场现象

■ 金海燕 职员

据某知名招聘网站统计数据,2017年成都建筑工人平均工资8300元/月,钢筋工、瓦工、木工、漆工等技术好的建筑工人特别走俏,月工资轻松过万。而经理助理、秘书、文员等“白领”的平均工资只有3800元/月,两者相差悬殊。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成都的建筑企业用工成本增加,技术型人才稀缺是导致用工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5月23日《成都晚报》)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作为蓝领的建筑工人,工资似乎不能与白领相比。白领在公司上班,学历高,不是大学本科毕业,就是拥有硕士博士头衔,因此白领的工资,自然应当比作为蓝领的建筑工人高出一大截。然而如今却出现了建筑工人工资秒杀白领的事实,并且不是出现在个别建筑工人与个别白领之间,而是出现在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平均工资水平上,自然会成为“人咬狗”式的一大新闻。

然而,建筑工人工资“秒杀”秘书、文员等白领,只是人才市场的正常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可以出现在建筑行业,也应当出现在更多的制造行业中,并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

首先,成都晚报的消息,虽然用了《建筑工人工资“秒杀”白领》的标题,其实它的表述并不科学,因为白领是一个巨大的范围,而消息中用来与建筑工人工资作比较的白领,只是“经理助理、秘书、文员”,应当承认,这些人是整个白领中工资比较低的,至于白领中的公司研发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营销策划人员……他们的平均工资,肯定大大超过建筑工人的平均工资。因此,只能说建筑工人工资秒杀了某层次白领,不能笼统说建筑工人工资秒杀了白领;其次,我们常说,职业没有贵贱之分,工作没有高低之别,有的只是对社会贡献大小的区别。当建筑工人凭借自己精湛的技术,为社会提供了大量人们所必须的产品——高楼、道路、高铁、桥梁,建筑工人的贡献大大超过某些经理助理、秘书和文员时,社会就得通过提高他们的工资收入,充分肯定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这样的社会分配模式,才是最科学合理的分配。相信在今后,作为蓝领的大国工匠们,他们的工资可能会大大超过一般白领,成为社会的高薪人士,也属正常;第三,当前建筑工人工资之所以能秒杀某些白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前一段时期社会轻视技能人才培养的必然结果。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物以稀为贵是一种必然。由于前一时期人人争着上大学,个个争着当白领,必然造成某些白领的过剩和大量技术工人的紧缺,尤其是对技能要求比较高的木工、漆工,建筑公司以高工资招揽人才,也就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必然现象。

有技能的蓝领,工资秒杀一般的白领,体现的是技术、技能的价值,中国的建筑业和制造业要走向世界,需要大量拥有高技术的蓝领工人。但愿技术工人工资秒杀白领,不仅出现在建筑行业,也出现在需要技术支撑的一切制造行业里,成为社会的正常思维和正常现象。

崔永元“网红带货之路”有点玄

■ 邓海建 媒体人

近年来,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以“反转基因斗士”的身份出现在大家视野之中,也拥有了不少忠实粉丝。但最近的一则消息,让崔永元陷入风口浪尖:近日,崔永元签名的璞谷塘商城已经悄然上线。璞谷塘主要出售食品,包括生鲜、粮油、副食、酒水等。据称,部分商品价格高于同类商品5倍乃至以上。(5月22日每日经济新闻)

有人说,“所有网红的归宿都是淘宝店”,崔永元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验证了这句话。其实早在2016年11月4日举办的2016中国新零售大会上,崔永元就曾公开表示,他已进入零售业,起因是3年前同“转基因泛滥”作斗争,他认为这是个责任和商机,“所以今年我成立了自己的食品公司,就准备为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提供非转基因的安全食品。”这份公益心,听起来就很难得。

花开两支,话分两头。在国内食品安

全叫人不淡定的当下,身为公众人物的崔永元,自费去美国拍纪录片、与方舟子激情论战,将敏感的转基因话题拎到台前博弈,并进而督促相关部门重视食安监管议题,其独立思考精神总是难能可贵。不过,“反转斗士”摇身一变成了食品摊贩,难免让人对其高调的反转言论有所警惕——莫非当初的反转基因作物,是为了卖今日的非转基因小米?

这话如果算是有点诛心之论的玩笑,那么,下面两点还是值得严肃认真商榷的:第一,如果一股脑地将“非转基因”当卖点炒作,甚至在广告词中使用暗示类语言传达“非转基因更安全”的诉求,这些做法都是不合法不合规的。农业部科技教育司2015年1月曾下发《关于指导做好涉转基因广告管理工作的通知》称,类似做法不仅违背《广告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导致行业无序竞争,更加剧了公众对转基因的恐慌情绪。相关网上商城要集中卖非转基因食

品,政策法律风险肯定比较大。第二,有网友提出来,相关网上商城每款产品后面都附上了一份检测报告。不过,比如大米检测报告,既不是根据大米国标,也不是按绿色食品标准,只是检测了不含各种各样的农药,亦没有宣称完全无农药和化肥。只是,这样的检测结果,算不算体系外的擦边球?

当然,只要合理合法,崔永元的网店卖什么价格,这是无须原罪的事。别说三五倍于常人,就是三五十倍,若是交易公平守法,市场行为上没有程序瑕疵,总是周瑜打黄盖的自由。高端市场或名人溢价,亦属于成熟市场经济之常态,实在没必要大惊小怪。再说,“反转斗士”的称谓也是舆论赐予的,指望崔永元做个不挣钱、只撒钱的公益人物,这样的道德期待太过冷血。

一句话,崔永元的“网红带货之路”,会否透支其公信是一回事、有无细节违规是另一回事。相较而言,后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才更值得公众关切。

降低企业杠杆率任重道远

■ 张国栋 职员

据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消息称,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任务之一,降低企业杠杆率进展顺利,并已取得初步成效,中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5月25日《人民日报》)

去杠杆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目前业界的共识是,我国当前总体债务规模和杠杆率水平并不高,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从我国当前分部门的杠杆情况看,企业部门杠杆率较高,风险相对较大,应该成为去杠杆的重点。因此,在去杠杆的任务中,有效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是当前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的关键。

现在看来,降低企业杠杆率进展顺利,并已取得初步成效,这是一个好兆头,令人欣慰。但需要指出的是,加杠杆容易,去杠杆则很漫长。有例为证,在去年“三去一降一补”五个主要任务中,

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和补短板等四个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唯有去杠杆却表现得大不明显。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1月底,我国国有企业负债总额升到87.6万亿元,同比增幅接近11%,其中地方国有企业负债总额同比增长12.5%。由此可见,国有企业总负债占GDP的比重不降反升,无形中增加了去杠杆的挑战。这说明,降低企业杠杆率不能满足已有的“初步成效”,而是不能乐观,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咬定“降低”不放松,努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企业杠杆率,增强风险防控能力。

如何有效地降低企业杠杆率?毫无疑问,在一系列综合措施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发挥好这两大基础性改革的作用是“当头炮”。其中的关键是要做好顶层设计,以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采取一揽子综合性措施。一方面,市场化、法治化的方式,就是在降低企业杠杆率的过程中,尽量减少行政性、指令

性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违法必究。另一方面,深化国企改革,加快“僵尸企业”的清理整合,强化企业自身财务杠杆约束,合理安排债务融资规模,有效控制企业杠杆率。优化融资结构,既要支持企业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又要加大股权融资力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同时,要以问题为导向,与时俱进,开出综合性药方,打好组合拳,既要积极,更要稳妥。既要降低企业杠杆率,也要防控银行风险,做到科学、有序、有效地降低企业杠杆率。

总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偏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成长中的烦恼”。要消除这一烦恼,化解债务中隐藏的风险,不能满足于“初步成效”,而是需要正视现实,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保持定力,久久为功,通过关键性基础改革和其他综合举措的推进,寻求取得更大的成效,把债务风险降到最低程度。

根治“散乱污”不能迷信“一纸封条”

■ 才云 公务员

根据国家环保部5月25日督查通报,截至目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各督查组排查出问题企业约5.6万家,其中发现“散乱污”企业问题3330个,新发现清单外“散乱污”企业655家,部分地区“散乱污”企业问题屡禁不止。(5月26日新华网)

“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通报背后读出这样一些信息:一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散乱污”单个企业规模不大,但数量较多,已占到污染企业的很大比重。根据前些时候公布的数据来看,“散乱污”企业已占污染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二是新发现的655家“散乱污”企业,当地以前并没有上报,在最近督查中被发现,均无环保治理设施和环保手续,木、石粉尘污染十分严重;三是仍有众多被列入清单的“散乱污”企业正在违法生产,甚至还有“散乱污”企业擅自撕毁封条继续违法生产等等。

从工作效果来看,环保督查组的确实

入各地实地开展了环保督查,检查了企业达标排放情况,对地方漏报企业进行了补登补录,而且对有的污染企业还贴了封条,环保督查对于深入开展环保执法、提高地方党政领导环保意识、提高企业遵守环保法律法规意识、依法生产经营来说,功不可没。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在河北、山东等多地“散乱污”没有被上报,成了“漏网之鱼”?为何有小污染企业,在生产、环保排放方面,什么证件都没有也能开机生产?为何有的小污染企业敢于撕毁封条继续生产?

说穿了,“散乱污”企业如此大胆妄为,不外乎有这么几个原因:其一是企业违法成本太低,企业违法后由于没有受到足够的处罚,这些小污染企业的老板们更有违法的底气 and 侥幸心理;其二是对违法企业没有采取停电、停机等有效措施,企业还可以继续生产,等检查组前脚一走,企业后脚又继续生产,给了“散乱污”企业违法生产的机会;其三是显示了各地还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一些地方为了确保税收、带动就

业,默许“散乱污”小企业落户,放任“散乱污”企业生产,不进行达标整改、不上报治理,甚至有的还给他们通风报信,使得这些企业在当地的庇护下,有了敢于撕毁封条的“勇气”。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散乱污”企业存在的这些主要问题,反映出了执法不严、处理不到位、责任追究不到位的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都是中国社会管理之力的一个缩影。可以这样说,仅靠一张封条,是难以管住“散乱污”企业的。

通过环保督查发现,构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污染的不仅有大污染企业,那些“遍地开花”“四处冒烟”的小型污染企业,也是污染重要源头,也为增大PM2.5数值作出了“贡献”。因此对于污染企业来说,“抓大放小”,很有可能出现污染源漏网问题。因此,只注意到“污染大户”而忽视了“污染散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环境污染问题。在重大污染企业已被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根治“散乱污”问题企业成为当务之急。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环境情况,是反映中国环保质量的窗口,更是首都北京的“脸面”,绝不能放任不管,须按照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严格执行环保法律法规,展示更大作为,下更大力气,采取更果断措施,加大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散乱污”企业整治工作,还当地碧水蓝天、绿水青山。

其一是摸清“散乱污”企业底数,对于能达标排放、不能达标排放的企业实事求是地进行分类,夯实根治的基础工作;其二是落实根治责任,对当地党委政府、环保部门要落实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按照“一岗双责”要求,在规定期限内严肃整治;其三是落实责任追究,到期没有完成根治责任的,要从严追究当地党委政府相关领导责任,以责任落实为突破口,倒逼推动环境大整治;其四是加大打击力度,对于严重违法违规企业,充当污染企业“保护伞”的官员,要展示执法最严的一面,依法依规追究企业和当事人的责任,“杀鸡骇猴,以儆效尤”,确保执法的严肃性和根治“散乱污”企业的社会效应。